

白鳥庫吉著
王古魯譯

塞外史地論文譯林輯第一

商務印書館發行

白鳥庫吉著
王古魯譯

塞外史地論文譯叢
第一輯

中華教育文化基金董事會編譯委員會編輯
商務印書館發行

中華民國二十七年七月初版

◆(93252A)

塞外史地論文譯叢第一一冊

每冊實價國幣壹元陸角

外埠酌加運費匯費

原著者 白鳥庫吉

譯述者 王古魯

編輯者 中華教育文化基金會
董事會編譯委員會

發行人 王雲五

印刷所 長沙南正路

發行所 商務印書館

各商務印書館

版權所有
翻印必究

(本書校對者 馮寶武 沈鴻俊 張叔介)

●E三九一九

錢



白鳥博士還曆小照

譯者敘言

關於白鳥博士的經歷及其著作，我已在另文中略爲介紹的了。他的著作雖是很多，可是至今還沒有刊行過單行本，所以我國學術界直至近年纔始對他有些注意，先有方壯猷氏集譯他的東胡民族考；最近又有傅勤家氏譯出他的粟特及康居考來了。

我的集譯此書的動機，卻並不打算專譯他一個人的作品。可是因爲他是日本的研究中國塞外史的權威者，所以決定先從他的著作譯起。我想假使能夠有系統地繼續介紹鄰邦學者所發表的塞外史研究論文，我想對於我國研究中外交通史者，多少可以供給一些參考資料。我因爲抱着這個見解，並且決心繼續從事，所以決定此書名稱爲塞外史地論文譯叢第一輯。

此輯所收的，完全是白鳥博士一人的著作，而且專限於大秦國拂菻國的問題（第二輯以下各輯，亦擬以此爲方針，集譯互有關連的文字於一輯之中，集中讀者的注意力。）就文字發表的年代而言，前後幾及三十年。此一問題，白鳥博士至今尚在研究之中。由此言之，亦可以明瞭「大秦國」及「拂菻國」在白鳥博士研究塞外史的過程之中，亦已成爲他所研究的中心問題之一了。此數篇文字，其中發表最早的，就是大秦國及拂菻國考；發表的日期，尚在去今已有三十年左右的明治三十七年（公元一九〇四年），其中雖不無誤謬之處，然而他所主張的

『黎軒』爲“Alexander”的對音，以及主張“Tabga”爲“Tangac”之轉，以爲“Taugas”卽「托跋」一字的對音，』至今仍未有所改變。所以他在見於大秦傳中的西域地理一文中，曾云：

『余自發表議論以來，亦有二十餘年，今日回顧此文，不無誤謬，或須增補，或有新見，所以在大正十五年內藤博士還曆祝賀支那學論叢中曾發表條支國考一文，考證「與大秦有密切關係」的條支國，就是幼發拉底河下流流域波斯灣頭的“Mésène-Kharacène”國，並於去年桑原博士還曆祝賀東洋史論叢中載見於大秦傳中的中國思想一文，詳說漢魏史策所載大秦傳之中，含有中國人所幻想的漂渺之談。茲欲再度考證「見於大秦傳」的地理，訂正增補舊日主張，最後並欲就大秦國的記事，加以歷史的考察。至於拂菻國，則擬他日另稿發表新解釋，廣徵學者相異的見解。』

由此段引文觀之，可以明瞭本書所收的大秦國及拂菻國考、條支國考，見於大秦傳中的中國思想，見於大秦傳中的西域地理、拂菻問題的新解釋、大秦的木難珠，卽在白鳥氏本人亦認爲互有關連互爲印證的文字了。惟其中拂菻問題的新解釋一文，自一九三一年至一九三二年間連續發表於東洋學報第十九卷第三號第二十卷第一號之後，至今未見廣續發表，不能令讀者獲見全豹，譯者頗引以爲憾。所希望者，白鳥氏早日寫成，則譯者當可譯收於第二輯中也。至於大秦的木難珠一文，原收入市村博士古稀記念東洋史論叢中，題爲大秦的木難珠與印度的如意珠，譯者以後半篇文字，本係自爲起落，所以僅譯一半，而縮改爲此題，這是亦須附帶聲明的。

關於譯述方面，當然力求信實，凡白鳥氏所引證之書籍，盡力之所及，大都取供參閱。苟白鳥氏所引之文，與原

文或有相違處亦大抵修正並加註說明譯名方面，除白鳥氏原文中附有漢名外，其餘關於地名一部分曾參考馬承鈞氏所編西域地名；一部分則選用較普通的譯音，惟其中有幾點，似有略加說明的必要：

(一) 一如上文所述，本書所收白鳥氏的論文，就文字發表的年代而言，前後幾及三十年，故其所引西名，大致隨當時所參考的書籍所載，同一固有名稱，拼音有時並不一致。例窩瓦一河，或作“Volga”，或作“Wolga”之類。甚至同一文中，亦有此種情形，例如大秦國及拂菻國考中「莫維亞」一名，白鳥氏或用“Moawia”，或用“Moawiah”，並不一致。關於後者，因求一律起見，譯文除原文引用沙畹氏的書句外，依據荷蘭萊登 (Leyden) 地方，“Late E. J. Brill Ltd.”所出版的伊斯蘭百科全書 (Encyclopaedia of Islam) 的拼法，拼用“Muāviya”，並因大秦國及拂菻國考中，所有關於回教國人名地名，頗多音譯而不附原名，譯文亦大都依據上述的伊斯蘭百科全書註出（但此書至今尚未出齊，故關於“O”，“P”，“Q”，“R”四首音的地名人名，尚無法查出。）例如「萬王之王」一個稱號（見史學雜誌第十五編第十號三〇九—三一〇頁）白鳥氏文中，不僅未附原名，且有一處將譯音「エネ——ル・アル・オムラ」的「エネ——ル」誤爲「エジ——ル」今亦將原名註出。按此一稱號，在大英百科全書中作“Amir ul Omara”，在新萬國百科全書 (The New International Encyclopaedia) 中，則作“Amir-el-Umara”，本書譯文則依據上述的伊斯蘭百科全書作“Amir-al-Umara”。附誌以免讀者誤會。

(二) 白鳥氏對於漢文，造詣頗深，但有時亦有誤解原文之處。例如見於大秦傳中的西域地理文中，於敘述「眩

術」(見史學雜誌四十(二編四號二三頁))之處，曾引魏書(卷百)西域傳悅般國條所載『……又言其國有大術者，蠕蠕來抄掠，

術人能作霖雨狂風大雪及行潦，蠕蠕凍死者漂亡者十二三』文字。我人苟自此段文義觀之，此處所言『其國有大術者』之『其國』顯指『悅般國』無疑。否則，如果蠕蠕人擅此術，則蠕蠕豈有「凍死者漂亡者十二三」之理。而白鳥氏下文竟有「蠕蠕的“fada”術」一語，顯係誤解原文，此句似不能成立。所幸此句對於其主張“fada”術起源於波斯一點，並無牽動之處，故譯者僅於此句之下，加註指出，以免讀者誤會。

以上各點，不過說明譯者譯述此書時所見及之點，惟業餘抽暇從事，精神容或有不及之處，如得海內同文，與以指正，固不獨譯者個人之榮幸焉。

白鳥庫吉及其著作

日本明治維新以後，史學界受過德國歷史學家李司氏（Ludwig Riess）的影響，發生了極大變動，建樹了所謂「東洋史學」的基礎（註一），人才輩出，成績斐然，而其中最為傑出者，厥惟白鳥庫吉博士。他具有豐富的言語的知識，採用西洋的研究方法；他的研究態度，不甘為傳統的學說所束縛，故對於歐西學者的研究結果，脫卻追隨盲從的境地，而立於再加檢討或批判的地位。研究所得，頗能獨創新說，而與歐美的東方學者爭勝。他所發表的著作，固然『謬戾雖仍未免，而精密處往往過之』（註二），毋怪他對於塞外史每有意見發表，歐人頗為重視，甚至他所發表的『「黎軒」為“Alexander”的對音；“Tabgač”一語為“Tangac”之轉，以為“Tangas”即「托跋」二字的對音』（註三）的主張，歐人亦有發表此類主張於其後者（註四），即此可見白鳥博士在世界學術界中亦有他相當的地位了。

我們假使從他的經歷來看，他所研究的範圍和途徑，極為明晰。大致出發於西洋史日本史，轉而研究朝鮮史，漸次推及東三省、蒙古、西域方面。因為他致力之勤，發表的論文極多，可是大都散見於各種雜誌之上，從未刊行過單行本，所以中國的讀書界，很少讀到他著作的機會。他是生於慶應元年（孝明天皇的年號，相當中國咸豐四年，公元一八六五年）二月四日，本年已有七十一歲的高齡了。明治二十三年（相當中國光緒十六年，公元一八九〇年）卒業於東京大學（東京帝國大學的前身）史學科，不久即任

學習院教授。當時他所擔任講授的課目，以西洋史爲主，旁及日本史，恐怕那時候就是他本人，亦沒有豫想到後日竟在東洋史方面享有盛名的吧？可是時機之來，往往出乎常人意料之外。學習院高等科方面，因受當時「創設東洋史運動」的影響，決定在中國歷史之外，添設東洋各國歷史一項課目。原擬中國歷史教授市村瓚次郎氏兼任授課，但市村氏以事堅辭，白鳥氏斯時既身任歷史地理課課長（「課長」相當「主任」）自不能不勉爲其難，先自朝鮮歷史開始，親自講授。此種因職務的轉變，使他研究的興味，亦改變方向。此種轉變，可說是從此奠定了他一生研究的基礎。其後因研究朝鮮史地，而感覺到研究東三省史地的必要，由此遞嬗，轉而致力於西域史地。此種研究徑路，從他所發表的著作來看，亦顯然可分，毋怪市村博士亦曰此種轉變爲東洋史學家白鳥博士出世的端緒了（註五）。

在他畢業於東京大學的前一年，東京大學文科大學裏的教授和學生，發起創立了一個史學會（註六），刊行史學會雜誌（今名史學雜誌）月刊，他即被推爲編纂委員之一。因之，最初十年之間，所著論文，大都在這個雜誌上面發表。

而且在他研究興味未轉變到朝鮮史地方面之前，所發表的文章，僅有歷史と地誌との關係（第一編）及歷史と人傑（第二編）二篇，其注意力尚未灌注到專門問題，顯然可見。可是自從他在史學雜誌第五編第十二號上發表了朝鮮古傳說考之後，以迄今日，除少數應酬文字而外，大都集中於上述的幾方面，一按本文文後所附的白鳥博士著作年表即可明瞭的了。他對於塞外史研究的論文，最初發表的，是匈奴は如何なる種族に屬するか（載明治

（公元一八九七年）的史學雜誌第八編第八號）突厥闕特勤碑銘考（載史學雜誌第八編第十一號）契丹女真西夏文字考（載史學雜誌第九編第十一・十二號）三篇。其中最值得提及者，就是突厥闕特勤碑銘考。因爲此文與後文所述的匈奴及東胡諸族語言考，同於公元一八九九年提交

萬國東方學會（是年在維馬開會）宣讀，引起世界各國東方學者注意，而使白鳥氏一躍成名的。案闕特勤碑銘於公元一八

九〇年在鄂爾渾河（Orkhon）河畔爲芬蘭人海格爾氏（M. A. Heikel）所發見，碑成四方的石柱形，除石座外，

高約一丈九寸五分六釐，在七尺六寸二分三釐之處，四面均刻有文字（東、南、北三面爲葉尼塞文字，西面則爲漢文），碑銘係唐玄宗開元

二十年（公元七三三年）所撰（註七），而蒙中人闕特勤，則爲骨咄祿可汗之子，苾伽可汗之弟。漢文碑銘曾於公

元一八九二年由海爾新福（Helsingfors）芬蘭畏吾兒學會（La Société Finno-Ougrienne）刊行，

題爲“Inscriptions de l'Orkhon recueillies par l'expédition finnoise en 1890”。歐西學者，如“Gabelentz”，“Schelegel”，“Radloff”，“Wassilyeff”等，紛紛譯述考證，錯誤之處，在所難免，白鳥氏此考，用意

即在彙集各家之說，而考訂其是非。所以在萬國東方學會中提出小冊“Die Chinesische Inschrift auf dem

Gedenkstein des K'ü Te K'in am Orkhon, übersetzt und erläutert”之中，首述各家的譯文及說明，然

後提出本人的譯文全文，並加考證，未附各家及本人的譯語對照表，俾讀者可以辨別正誤。與此考同時提出者爲

“Über die Sprache des Hing-nu Stammes und der Tung-hu Stämme”（匈奴及東胡諸族語言考）。

（註八）此文以原稿提出，原定委托日本出席此會會員坪井九馬三博士代爲宣讀，後因夏德氏（Friedrich Hirth）

對於此文，極感興趣，自告奮勇，代爲宣讀。夏德氏復與拉德洛夫教授（Prof. Radloff）熟商，將此文掲載於彼得

堡的學士院雜誌（Bulletin de l'Academie de Science）十三卷二期（公元一九〇〇年），從此歐西學術界亦知日本

有白鳥其人了。提出上述二篇論文於萬國東方學會的翌年，即得日本博士會的推薦，白鳥氏獲得文學博士的學

位。明治三十四年（公元一九〇一年）奉學習院之命，赴歐洲各國留學，使白鳥氏對於中亞各國言語，獲得學習的機會。先至德國柏林，受學於地理學地質家黎希托芬（Ferdinand von Richthofen），並在東洋學校中學習土耳其語；復往匈牙利，在婆達倍斯（Budapest）繼續學習土耳其語，兼習匈牙利語。留匈期內，將前載史學雜誌的烏孫に就いての考，譯爲德文，揭載於婆達倍斯的學術雜誌東洋評論（Keleti Szemle）。同時上文所述的匈奴及東胡諸族語言考又爲匈牙利學士院的人類學雜誌（Ethnographia）譯載，並附加匈牙利博士著名的芬蘭畏吾兒（Finn-Ugri）研究家蒙加契（Dr. Munkasci）的評語，頗引起匈人注意（註九）。匈人原係東方人種，所以對於烏拉爾、阿爾泰民族的研究，極爲盛行，學士院所刊的東洋評論，專載此類文字，而寄稿者大率爲各國著名之士。例如德國的夏德（Foy），馮克勒爾（Winkler），丹麥的湯姆孫（Thomson），俄國的拉德洛夫等。白鳥氏抵匈後，亦屢有稿件投載，據其調查，匈國圖書館中，絕無論及中國與日本的書籍，但敘述侵入西洋的亞細亞民族的書籍，則觸目皆是，故當時白鳥博士蒐購書籍雖多，然尙以「限於經濟未能多購」爲憾也。留匈期內，亦曾隨東洋學校中的教授學生，同遊土耳其、保加利亞各地，以廣見聞。一九〇二年萬國東方學會在德國漢堡開會，日本學者參加者共十人，白鳥氏亦與其列。此次爲白鳥氏首次參加此會，在會中所宣讀的論文爲烏孫考及朝鮮王號考（二文均用德語。後者曾刊載於一九〇三年三月的東洋評論上，其匈牙利語譯文，則載於婆達倍斯的人類學雜誌上。）在開會期內獲得接觸各國碩學之士的機會，並與夙日慕名的夏德氏、湯姆孫氏、拉德洛夫氏訂交。會後即赴法國巴黎，在法蘭西學院（College de France）及東方語言學校（L'École de Langues Orientale）二校學習東洋語學，並與沙畹教授、高迪歐教授、斐維教

授等過從甚密，獲益不淺。其後又遍歷英意土及東歐北歐諸國，於明治三十六年（公元一九〇三年）十月返日。返日之後，鑑於東洋史地研究的需要，即與學界名流合力提倡，創設亞細亞學會（註十），以種種關係，未能有所進展，至明治四十年得平田東助男爵、伊東忠太博士的斡旋，與當時桂太郎伯爵所主宰的東洋協會（註十二）合併，擔任該會學術上調查事業，定名為東洋協會學術調查部，自任主任，並於明治四十二年（公元一九〇九年）七月發行東洋協會學術調查報告，不久即得法國銀行家阿爾倍爾·康（Albert Kahan）氏資助，開始刊行學術雜誌東洋學報（年出三、四期不等，至今繼續刊行，現已出至第二十三卷第四號）。使之克享學術界盛名，不能不說是白鳥氏提倡維護的功績不小。日俄戰後，日本既已決定創設南滿洲鐵道株式會社，開始經營南滿。白鳥氏得當時文部省次官澤柳政太郎氏的介紹，又向滿鐵首任總裁後藤新平男爵建議在社中創立學術調查部，調查東三省、朝鮮的歷史地理。他所以有此建議者，完全出於下列二種見地（註十三）。其一謂出於經營滿韓的實際需要，所以他說『我人苟念及半島國之與我國有密切關係，古今無異，而半島上風雲的動搖，亦常起於滿洲曠野之間，因而念及滿洲有關我國國運消長，亦古今相同。則究明滿洲方面民族競爭真相，知悉現時形勢的由來，治世者亦豈能等閑視之！』其一則謂出於純粹的學術的見地，所以他說『歐西學者努力於研鑽東方學方面，已有多多年，凡自然界現象，以迄人種、言語、宗教、學術、文藝等，經彼等闡微顯幽者甚多，而其研究的地域，無論波斯、印度，即中央亞細亞以迄中國老文明國；西伯利亞曠野以迄安南半島，金亞細亞各地，彼等所嘗試的學術上研究功績，真可驚歎，日本學者，實多依賴西人之教，始得知東洋之事。我人對於歐西學者固抱極度尊敬與感謝之念，同時思及東洋國民對於世界學術方面貢獻甚少，尤覺慚

愧不勝。至於滿洲朝鮮，因其地處僻遠，尙多西人未加討究之處。今日此二地域，幸已開放於我學界之前，我人如欲研究我國國民地理上文化上關係，亦得特殊利便，我國學者，其勿失此良機！此種措辭，在戰後日人大陸發展的氣勢高潮之際，自易動聽。後藤氏即於會社之內，添開調查部，囑托白鳥氏爲主任，並由白鳥氏招集池內宏、箭內互、松井等、津田左右吉、稻葉岩吉等數人分任調查研究。他們在調查研究之先，就豫定了兩個方針：（一）闡明滿韓歷史的地理；（二）由近代推及上代。關於（一）項方面，他們的理由是因爲歷史的基礎，在於地理，地理如不闡明，則事實無從探究。關於（二）項方面，上代事蹟，史籍甚少，研究不便，而近代則材料比較豐富，故先事研究，然後追遡上代，他們認爲此乃最適當的順序。方針既定，於是池內氏在白鳥氏指導之下，開始研究。研究所得，首先發表者，即爲滿洲歷史地理二冊及朝鮮歷史地理二冊。此種事業，繼續從事者七年，後因會社總裁屢屢易人，當局對之興味淡薄，遂以此種工作委托東京帝國大學，仍由白鳥博士主持其事，每年刊行滿鮮地理歷史研究報告一次。以迄今日。報告之中，所載論文，精采者頗多，亦曾引起我國學者注意。王靜庵氏且摘譯數篇。

（箭內互氏雜誌
考三篇譯文。）

（觀堂譯稿下，收津田氏室
章考、澤代鳥古獻烈考；

（註十三）了。大正八年（公元一九一九年）被推爲日本帝國學士院會員，十一年（公元一九二二年）奉東京帝

國大學之命，考察歐美各國學術界情況，適亞細亞學會舉行成立一百週年紀念會，白鳥氏即代表東京帝國大學總長出席，宣讀祝文，並於部會之中，宣讀“Sur l'Origine de Hiong-nu”（匈奴起源考）論文。會後遍歷美、法、英、德、荷、澳、意、埃及等國，所過各都市，凡歐洲東方學者的著作，均詳爲蒐集。過荷蘭海牙時，且與記錄局交涉，抄錄

有關中日的文件而歸。十三年歸國，適岩崎家收買莫理遜文庫之後，業已決定開設東洋文庫，並決定分設圖書部及研究部，乃商諸白鳥博士，請其主持研究部事。白鳥博士即爲之計劃一切，招集研究人員，出版「普通書店所躊躇顧慮銷路，不敢冒險刊行」的書籍及研究作品（註十四）。十四年壽臻還曆，所任東京帝大講席，例應停職，從此捨棄教授生活（東京帝大舉之，爲名譽教授），專心主持東洋學報及東洋文庫研究部，且於十五年（公元一九二六年）起，在東洋文庫中開設東洋學講座，除本人演講塞外史一類問題外，廣聘學者主講，每年舉行三四次不等，以迄今日，裨益學子，實非淺鮮。博士雖常自謙，早年頗怠於學問，然卒業大學之後，始終一貫，孜孜矻矻，研求學術情形，成績歷歷可尋。其所以能有如此成就者，端賴語學方面有相當根柢。卒業大學之時，雖僅通英、德兩語，其後續學法語、朝鮮語，初次留學歐洲之際，又學土耳其語、匈牙利語；歸國之後，再學俄羅斯語、滿洲語、蒙古語。前後所學，不下於十種語言，故對於西人所著有關東亞方面的著述，無不寓目，於是所見日廣，而著述日益豐富了。

一如上文所述，白鳥氏研究的範圍極廣，三四十年来所發表的論文極多，除若干專論中國上古史的問題外，大體以中國塞外史地爲研究問題。其摯友市村瓚次郎博士曾敘述白鳥氏研究概要於白鳥博士還曆紀念東洋史論叢の序に代人（註十五）一文中，簡而扼要，爰轉引其語於下：

「博士的研究範圍，可分「東」、「西」、「南」、「北」四部觀察。東部又區分爲三：第一爲朝鮮；第二爲滿洲；第三爲日本。北部爲蒙古民族。西部爲中央亞細亞及西南亞細亞民族。南部則僅僅研究亞細亞南部一小部分而已。

東部

關於朝鮮，白鳥氏首先批評「檀君開國說」，目爲出於後人的假托，其後又對於箕子的傳說，亦考證爲並非歷史的事實。繼又考定漢武帝時所置朝鮮四郡的境域，斷言九都城與國內城的位置是一非二，並以此比定今日的輯安縣。此外，進一步研究朝鮮語的系統，最初主張朝鮮語與日本語屬於同一系統之說；其後一變舊說，論斷朝鮮語與日本語系統完全相異，應屬於烏拉爾阿爾泰語族（Ural-Altaiic family），並以爲「諺文」（朝鮮所製之文字）最初亦曾受蒙古文字影響，往後始出於鮮人獨創云。關於滿洲，白鳥氏曾證明古代穢貊與肅慎、靺鞨同屬通古斯民族；並考定唐代的流鬼國，卽爲今日的庫頁島。又曾親身實地調查，確定寧古塔南方的東京城爲渤海上海京龍泉府；阿勒楚喀南方的白城爲金代上京會寧府。關於日本，則從言語學的立場，論證日本民族爲世界上特異的民族，並主張「用記」（指古事記）「紀」（指日本書紀）的「神典」來解釋民族的由來，並不妥善，因爲此種神典係一種神話，乃是用來描寫國家的尊嚴及其由來的；此外又對於魏志倭人傳及梁書的扶桑國等記事，發表新穎意見。

北部

歐洲學者之間，久成論題的匈奴，白鳥氏最初斷定其爲突厥種，其後重行斷定爲蒙古種。至於東胡，則以爲原係蒙古種，多少雜有通古斯種的血液，且斷定烏孫爲突厥種。此外，對於被稱爲韃靼的部族，論證其一律爲蒙古種；及至最近，又斷定獯狁爲突厥種，與匈奴種族相異。

西部

主張大宛的貴山城爲「Kāsān」，康居住地，爲黠戛斯平原，而康居民族則爲突厥種。康居問題，駁斥了歐人所比定爲「伊蘭民族住地的『Sogdiana』」之說。對於塞民族，以爲見於漢書中的塞族，爲天山北方

的突厥民族，而侵入印度的“Saka”，則爲阿富汗的伊蘭民族，闡明二者之間，絕無任何關係，推翻了歐西學者的「塞與“Saka”爲同一種族」之說。對於大月氏與大夏的關係，他又發表新說，主張「大夏即指“Bactria”，而係“Tokhâra”的譯音。但“Tokhâra”係民族的名稱，即係月氏。月氏原爲河西地名，此地住有突厥種的“Tokhâra”民族，漢人仍以原住地地名呼之，而以爲此名與大夏是二非一。」又考定迦貳色迦王的年代爲公元二世紀中半，並自罽賓的形勢上推測，對於魏略所記有關佛教東漸的記事，大生疑義，乃論斷侵入印度的“Kushan”（即貴霜欽侯）爲伊蘭種的土著人民，雖曾服屬於大月氏，但並非同一民族。此外又主張罽賓在漢代，指“Gandhâra”，其首府修鮮城，即爲“Susan”（即Puskalawati）；比定大秦國爲埃及的“Alexandria”，論述魏略及魏志中所載大秦國的風俗等等，係漢人運用中國思想所構成的空中樓閣之談；並以爲「大秦」及其都城「安都」的名稱，亦不外乎淵源於此種思想。博士對於北狄及西域諸問題，殆以全力傾注從事解釋。此種情形，不僅是他因爲歐洲東方學者對於此一方面頗多論述之故，企圖與之對抗；而主原因，完全在於他依據他的「東洋史必須以漢民族與北方民族的勢力消長，及漢文化與西域文化間交涉關係爲中心」的主張，纔向這兩方面盡力開拓的。

〔南部〕從來絕少研究，最近纔始對於赤土國，提出創見，論證其爲蘇門答刺的東南部，將來對於此方面，或再有研究，亦未可知。」

白鳥氏的研究方向，就上引文中，已可約略看出。他的不甘爲傳統學說所束縛的態度，亦曾引用到研究中國古代